

春秋三传

乱世的青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梦生 著

国学基础教程·经部

春秋三传

乱世的青史

国学基础教程·经部

李梦生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秋三传:乱世的青史/李梦生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7

(国学基础教程·经部)

ISBN 978-7-5325-4966-5

I. 春... II. 李... III. ①中国—古代史—春秋时代—编年体②春秋—通俗读物 IV. K225.0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5570 号

国学基础教程·经部

春秋三传

乱世的青史

李梦生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l@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20 印张 8.2 插页 3 字数 124,000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300

ISBN 978-7-5325-4966-5

K·1072 定价:16.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出版说明

“国学”一词，如果仅按照语词来解释，“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见1999年版《辞海》）。但如将“国学”作为一个体现中国独特而古老文化的专用名词的话，其内涵则历来未有权威的论断。如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著名学者吴宓认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胡适则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现代一般人对“国学”的理解，大多沿革于胡适。

然而，不管学术界如何争议，构建国学的基础为国故，也即中国传统文化，却是明确而不变的，那就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及历代史学等一套我国所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这个基础体系如果用我国传统的分类法来区分，便是恢弘而灿烂的经、史、子、集四部。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化，“国学”在经历半个世纪的被冷落，近来却又以“国学热”的形态兴隆起来。“国学热”，已成为当前中国文化发展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然而追本溯源，当今的“国学热”与“五四”运动前后对国学的提倡却有所异同。当时“国学”概念的提出与确立，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就此而言，现在的“国学热”与百来年前一脉相承。然而，如果说当时的国学提倡，更多地体现于严肃的学理、学术层面上，那么当前的“国学热”却具有明显的普泛性。这种普泛性有其深刻的底蕴：不仅是学术界，上至中央、下至百姓的整个中国社会都在苦苦地探究，在世界视域的今天，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究竟应向何处去？然而凡

事一经普泛，尤其在普泛以至形成“热”潮之际，便需要一份冷静，以免“热”潮流于浮泛，堕于时俗。在“让历史文化走向大众”的潮流中，我们认为有一个“如何走向”的问题。要言之，也就是深化和浅切的统一，就学术层面而言是富于现代意识的深化，而就表述手段而言，则要求学术思想的社会性的浅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暂不必再就“国学热”这一名称的学理性是否科学聚讼不休；重要的是，须从其社会实践的本质意义，也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以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体系的建构提供一方面的营养，来做一些必不可少的工作。要言之，有两件事情：

一是精选。即用最小的篇幅，介绍国学中最精彩、最有生命力的精华。虽然，所谓的“最小的篇幅”只是相对而言，但无论如何，我们这套由三十本左右的小册子组成的“国学基础教程”，相对于汗牛充栋的国学典籍来说，实在是精选到极致了。

二是解读。既用通俗而不失学术内涵的文字来填平横亘在现代汉语和古文之间的鸿沟，更须在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对文化现象作具有世界视域的现代人的解读。

总之，让广大向往国学的读者更方便、更快捷、更正确地了解国学的基础知识，从而在初涉国学这座辉煌的文化殿堂时产生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并激发个性化的思考，就是我们编撰这套“国学基础教程”的宗旨；而“基础教程”四字，则标志了我们企图将学术性与浅切化统一起来以“提升阅读”的努力。

本《教程》的作者，都是于某经典有积年研究心得的专家；而同时，我们又请作者或其他专家于各书每一章节的最后，给出一至两道思考题，以期多元化地启发读者在阅读各书内容后，再结合其他的知识和当今社会的现状作出自己的思索。这也是我们对孔子“学而不思则罔”这一教诲的礼敬。

最后要说明的是，为了体现国学传统的原味，这套“国学基础教程”也将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为四小套。同时为了读者购买和收藏的方便，每套的封面我们也将以四种颜色——绿色（经部）、红色（史部）、蓝色（子部）和灰褐色（集部）以示区别。当然，这种做法并非我们的发明，清代乾隆年间编成的赫赫有名的《四库全书》就是这样做的。而经、史、子、集四部的具体内容，则请参见每一分部各书封底的书目。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言

“春秋”二字本来是中国古代纪事史书的通称，各国都有自己的《春秋》，可惜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鲁国《春秋》一部了，所以《春秋》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鲁《春秋》的专用名称。《春秋》的作者，一向说是孔子编的。传说鲁哀公十四年，鲁国有个猎户捉到了一只独角怪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把它杀了。消息传到孔子那儿，孔子跑去一看，认出怪兽是麟。他叹息不止，说麟是应当在天下太平时出现，现在出现是倒了运；他流着泪感慨自己的道义不行于天下，便取鲁史所修《春秋》进行加工编撰，花了九个月而成书，想要人们从中得到扬善弃恶的教训。所以《春秋》又被称作“麟经”。

《春秋》记事，从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到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获麟止，共计二百四十二年，后世因此称那段时间为“春秋时代”。书虽然用的是鲁国纪元，却兼记各国事，因此它不仅是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也是第一部中国通史。

《春秋》记事的目的，据后人阐发，主要是劝惩。其一是劝恶扬善，即提倡道义，从成败中引发教训。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见，《春秋》之作，是孔子用以定名分，制法度，以息邪说，以禁暴行。其二是提倡攘夷尊王，提倡王霸、王道。这些，都与孔子其他的著作中所宣扬的儒家思想是一致的。

然而，《春秋》本身的文字十分简练，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书中通常只用一句话来表达，有些像现在报纸的标题新闻，要体会意思很难，于是就出现了专门解《春秋》的人，他们解《春秋》言论的专门著作就是“经传”。先师（孔子）所言为经，后来学者解经文字

为传，这是传统经学的划分法。《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笔就是记下来，削就是删除不写。这笔削之间，被认为都有大道理存在。《春秋》的所有经传都指出《春秋》有“书法”，存在“一字褒贬”，有“微言大义”，经传的目的就是阐发孔子的褒贬与大义。这一点，请参读本书《存褒贬于一字中》篇，而全书的各篇中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这个内容。

解经的书，《汉书·艺文志》载有五家：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邹氏、夹氏。现今存世的只有前三家，并称为“三传”。三传的侧重点不同，《左传》以叙事为主，《公羊》、《穀梁》以解经释义为主。三传的观点、记事大致相同，但同中又有异，所以古人认为《春秋》之法，信者传信，疑者传疑，所以经与传之间、传与传之间，都没有刻意求一。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左传》是史家，《公》、《穀》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宋代葉梦得《春秋传序》也说：“《左氏》传事不传经，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这些话，都高度概括了三传各自的特点。

《左传》全名《春秋左氏传》，是三传中最出名的一传，它的作者，相传为左丘明。左丘明，有人说是鲁君子，也有人说是鲁国的史官。《左传》的成书年代，一向没有得到确认，从书中所记的内容来看，一定远于孔子卒后。自宋代以来，经学家便开始怀疑《左传》不出于左丘明之手，有人认为是战国初年魏国史官的著作。清桐城派大家姚鼐《惜抱轩文集》卷三《左传补注序》以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姚鼐还说《左传》中以吴起加入的最多，所以于魏国事造饰尤甚。这些纷纭众说，简直无法寻出正确的头绪来。

《左传》编集大体依据《春秋》，重点在述史事，同时征引孔子的话及当时“君子”的评论。因为《左传》常有无经之传及经传相异的记载，所以常被人认为“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晋书·王接传》）；不过大多数人不同意这一点，认为“《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目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桓谭《新论》），不仅指出《左传》依附于《春秋》，还精

辟地论述了《左传》对《春秋》的作用。

《左传》详细地记载了春秋间各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人物的生平行事。它善于把复杂的事写得有条不紊，剪裁得当；又善于以优美流畅的笔墨写事、写人，所以杜预《春秋左传序》说它“其文缓，其旨远”，赞赏它的委婉与含蓄。这些优点，被后代史学家、散文家奉为规矩与楷模。不过，《左传》不时渗入卜筮、鬼神之说，与《春秋》相左，也经常受到批评，范宁《穀梁传序》就认为“其失也巫”。

《公羊传》是三传中最早得到承认的一部经传，它的作者，《汉书·艺文志》说是齐人，颜师古注云“名高”；唐代徐彦疏引戴宏序说，孔子《春秋》学，由门人子夏传公羊高。《公羊传》初以口头传授，到汉景帝时，公羊高的后代公羊寿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始以文字流传，是汉代最风行的《春秋》学，被尊信诵习，立于学官。《穀梁传》立学官在《公羊》稍后；《左传》只是行于民间，到东汉建武时始立于学官，不过流传极广，《汲冢书》中有《师春》一卷，所记卜筮事就全同《左传》。

《公羊》解经，力主阐发“微言大义”，素有“三科九旨”之说。第一科为“张三世”，即把春秋十二世分为三等，以孔子经历的哀、定、昭三世为“见三世”，襄、成、宣、文为“闻四世”，僖、闵、庄、桓、隐为“传闻五世”，说孔子在记这些朝代时书法各异。第二是“存三统”，即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第三是“异内外”，即内其国外诸夏，外夷狄。这三科每科三旨，即三个说明纲的细目。

《公羊传》鼓吹《春秋》大一统思想，强调王道，汉大儒董仲舒概括其大旨为“奉天而法古”，并发挥《公羊》思想，撰《春秋繁露》，形成完整的哲学体系，被历代奉为最有成就的公羊派经学大师。而清末维新派康有为又利用《公羊》“三世”说，作为改良主义的理论根据，强调变，要求实现“大同世界”，给旧经学赋予新意义。

《穀梁传》也是解释经文的书，传是孔子再传弟子穀梁赤所作，最初由口头相传，到汉初才成书。《穀梁传》释经大旨与《公羊传》相仿，这里就不再详细介绍。二者在风格上的区别与优劣，范宁《穀梁传序》说：“《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晁公武认为：“三传之学，《穀梁》所得最多。”胡安国说：“学经以传为案，则当阅《左氏》；玩辞以义为主，则当习《公》、

《穀》。”正因为有这些区别，三传才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行不废。

以《春秋》为五经之一，始于汉武帝时。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设五经博士，治《易》、《尚书》、《诗》、《礼》、《春秋》，后以《春秋》与《左传》合为一经。唐又合《周礼》、《仪礼》、《公羊》、《穀梁》为九经；至唐开成时，又加《孝经》、《论语》、《尔雅》称十二经；明再加《孟子》称十三经。因为《春秋》脱离了传，文字既干燥无味，史事亦模糊不详，意义则混朦晦涩，所以历代治经必以传同行，形成了治《春秋》的公羊、穀梁等派。历代注三传者很多，最著名、通行的，《左传》是晋代杜预注，唐代孔颖达疏；《公羊传》是汉代何休注，唐代徐彦疏；《穀梁传》是晋代范宁注，唐代杨士勋疏。

《春秋》的王霸思想及贯穿儒家思想中的民本主义在《春秋》及其三传中的反映，一直被人们信守遵循；《春秋》与《左传》在记录历史中所采用的各种“书法”，如“一字褒贬”、“为尊者讳”等，是后世史传奉行的金科玉律；《左传》在文学、艺术上的特色，又成为历代史传及通俗小说所模仿的典范。这一切，使得《春秋》及其三传受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所重视，其广泛程度超过了十三经中任何一部。鉴此，我们读《公羊》、《穀梁》，可以单纯地当经读；读《左传》，则必须既当经，又当史，又当文学作品来读，来鉴赏。

然而，三传虽然以宣扬孔子思想为鹄的，但是说得大胆一些，《公羊》、《穀梁》的大部分文字都在活剥经文，冗杂重复，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可以说是味同嚼蜡。要通过《公羊》、《穀梁》来了解孔子的思想，还不如直接读《论语》；要通过《公羊》、《穀梁》系统地介绍孔子的思想，就不得不把《论语》串进去一起谈，而本丛书已有介绍《论语》的专册。因此，本书在选录三传时，是以《左传》为主干，只是象征性地选了几篇《公羊传》、《穀梁传》中的精华，以一禽代全鼎。在编排时，依丛书体例，分成“沙场争霸”、“贤臣达人”、“篡逆奸谋”、“无道昏君”、“论辩辞令”五个部分。这些内容，其实在每篇文章中都交叉缠结在一起，所以这个分类只能是大致上的；而在每篇的述评中就不得不时时游离每类的中心铺展开来，否则难免把雷同的意思反复地唠叨。述评的内容，既立意于阐发经传的思想，同时兼顾史实的排比，使读者能从儒家思想与史实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

目 录

目 录

出版说明 / 1

前 言 / 3

第一章 沙场争霸 / 1

一、宋襄公假仁失众 / 3

二、霸主业成万骨枯 / 7

三、秦穆公引咎自责 / 18

四、对敌人讲真话的君子 / 27

五、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 33

第二章 贤臣达人 / 45

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 47

二、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 52

三、防言犹如防川 / 60

四、郑子皮慧眼识英雄 / 64

五、勇士轻身酬主恩 / 69

第三章 篡逆奸谋 / 75

一、郑庄公养恶待满 / 77

二、存褒贬于一字中 / 83

三、及瓜不代的后果 / 86

四、楚成王临死乞熊掌 / 90

五、郑子公食指大动 / 95

六、造谣毁谤者的下场 / 99

第四章 无道昏君 / 105

一、肯爱千金轻一笑 / 107

二、卫懿公好鹤亡国 / 113

三、大丈夫恩怨分明 / 117

四、晋景公梦鬼索命 / 124

第五章 论辩辞令 / 129

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 131

二、烛之武退秦师 / 136

三、楚庄王从谏如流 / 141

四、《诗经》的妙用 / 145

五、挡不住的金钱诱惑 / 150

篇目索引 / 154

第一章

沙场争霸

战

车隆隆，马鸣萧萧，干戈耀日，枹鼓喧天，这样的战争场面，差不多可以作为春秋的时代象征。后人沉溺于“封建”优劣的讨论时，不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封建与战争的同一性。

周王朝的衰落，使得巩固的集权封建制瓦解，诸侯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争霸浪潮中，先后出现了所谓“五霸”。这五霸，《荀子》认定为齐桓、晋文、楚庄、吴阖庐、越勾践；《风俗通》载为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霸主们除了表面上提倡道义外，莫不以武力为最强有力的手段，在二百多年间，就发生了大小战争四百八十三次。

《春秋》及其三传，虽然强调“春秋无义战”，却又提倡“尊王攘夷”，宣扬王霸思想，记下了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争。《左传》流畅而富有文采的记录，使这些描写战争的片段更加脍炙人口。

“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红楼梦》），“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张养浩《山坡羊》）——这是后人的感慨。感慨时的心理必定是多元的，今天也一样。

不断的战争，引出了春秋后战国这个历史名称。

宋襄公假仁失众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原文〕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

战。勅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裔，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儛可也。”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今译〕

宋国发兵攻打郑国，楚国为了救援郑国，出兵攻打宋国。宋襄公将要与楚军作战，大司马公孙固（字子鱼）进言劝阻说：“上天不保佑商朝已经很久了，现在您打算要复兴它，这种违背天意的做法是得不到赦免的，还是不要与楚国打吧！”宋襄公不听。

宋军与楚军相遇，战于泓水（故道在今河南柘城）。宋军已经摆好了阵势，楚兵还没有完全渡过河。公孙固说：“敌众我寡，趁他们还没有完全渡过来，赶快下令进攻他们。”宋襄公不同意。楚军渡过了河，还没有列好阵势，公孙固又请襄公下令攻击，襄公仍然不同意。等楚兵摆好阵势后，宋兵才发动进攻，结果大败，襄公的大腿也受了伤，近卫军被杀得一千二净。

宋国的百姓都怪襄公不听公孙固的话，以致惨败。襄公说：“君子不对已经受伤的人再加伤害，不擒捉头发花白的人。古代用兵之道，不凭借险阻以攻击对方。我虽然是亡了国的商朝的后代，但仍然不会下令攻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公孙固说：“你并不懂得作战的道理。实力强大的敌人，被险隘拦阻而没有摆好阵势，这是上天帮助我们，我们利用他们受阻的有利时机发动攻击，难道不可以吗？这样做尚且担心不能得胜呢。况且现在的强者，都是我们的敌人，即使是年纪很老的人，能够俘获的话就抓他来，对头发花白的人又怜惜什么呢？告诉大家战败辱国是可耻的，教导士兵要勇猛作战，目的是为了更多地杀死敌人。敌人受伤了还没有死，为什么不再次去杀伤他？如果你可怜受伤的人而不去再次杀他，还不如起初就不要伤害他；怜悯头发花白的人，那还不如就向他们顺服。凡行军作战，要凭借有利条件而行动，鸣金击鼓是利用声音来激励士气。乘敌人受到险阻时发动攻击，是可以的；乘敌人没有排成战阵，以金鼓激励斗志向他们进攻，也是可以的。”

〔述评〕

齐桓公死后，众公子争位，齐国大乱。这时宋襄公任用公孙固，国内大治，遂有代兴之志。他先平定齐乱，立齐孝公；又举行“鹿上之盟”，俨然以中原霸主自居，企图与南方日益强大的楚国争强。不久，郑国与楚国相亲，宋襄公便学当年齐桓公，发兵征讨“亲附蛮夷”的郑国。楚国出兵救郑攻宋，两军战于泓水。宋襄公为得人心，表现自己“霸主”的气度，在对敌作战时讲究仁义道德，结果大败，失去民心，宋国从此也一蹶不振，襄公在难圆的霸主梦中郁郁而亡。

宋襄公这番“仁义”之举，究其本心，是中了好名的毒害。孔子说：“必将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语·子路》）宋襄公片面追求人家对他的评价，用以争取霸主地位，就是企图正名，然后指挥诸侯，结果弄得身败名裂，贻笑千古，他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庄子说“名者，实之宾也”，就是劝告世人要讲究实际，不要务虚名，可惜宋襄公不理解这一点。

当一个人利欲熏心时，往往会干出一些意想不到的蠢事。人们在读《左传》这段文字时，如果以为宋襄公是个君子，那就错了；如果认为宋襄公是个中了片面讲仁义道德之毒的迂腐之君，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宋襄公本来是个无知残忍的人。他初次会合诸侯时，小国鄆国的国君迟到了，宋襄公认为他有意怠慢自己，为了立威，竟然杀了鄆君，又把他的尸体放到鼎里煮熟了祭睢水之神。这种对盟国国君惨无人道的行为，与泓水之战时对敌国士兵的爱惜态度，谁能相信是出自于同一个人呢？残忍也好，仁义也好，宋襄公的一举一动都是做给别人看的，都是名利心作怪的表现。因此曹国大夫僇负羁早就论定说：“宋躁而虐，事必无成。”宋襄公虽然列名春秋五霸，实际上他的霸业从来没有



◎ 宋襄公、公孙固像

真正实现过，后人作诗讥嘲他说：“一事无成身先伤，但得迂语自称强。腐儒全不稽名实，五伯犹然列宋襄。”可以说讽刺得恰如其分。

如同宋襄公那样讲仁义而失败的，古代也不是绝无仅有。战国时还有个燕王，他忽然想到要学尧舜讲禅让，结果就更惨了。燕王名哙，他登基后用子之为相。子之为人贵重主断，他的好朋友纵横家苏代想让他独掌大权，多次在燕王面前摇唇鼓舌，旁敲侧击，使燕王把国政都委托给子之。这时有个名叫鹿毛寿的人为拍子之马屁，抓住燕王好名的特点，劝燕王学尧舜禅让，这样可以贤名传于天下。燕王听了深信不疑，真的把王位让给子之，自己北面称臣，搬出宫殿。结果燕国大乱，齐湣王趁机入侵，攻下燕都，子之战死，燕王哙也自杀了。一场法尧舜禅让的闹剧，使国家颠覆，人民流离，名之害人也够大的了。

像宋襄公、燕王哙这样追求表面声誉而干蠢事，效法的人很少。后世的帝王，一方面喜欢人民说他们是尧舜之君，求贤若渴，垂拱而治；另一方面则不惜采取各种卑鄙手段，对付可能动摇他们地位的人，要叫他们主动让国让位，简直是做梦。反而是那些威逼别人让位的人，却喜欢搞禅让的把戏，把自己说成是大禹那样的贤人，如魏代汉、晋代魏都是如此。

《春秋》对宋襄公这种蠢猪式的仁义显然是抱嘲笑态度的。本来作为一个商朝亡国者的后裔，能保住别人施舍给你的一小片领土已经不错了，还妄图称霸，真是不识时务。公孙固的一番话，把宋国不可能复兴说成是天意，已经是很客气的了。一个亡国之君的后裔，不管他有多大本事，人们从感情上总是很难接受他的。我们翻阅先秦典籍就不难发现，在一些寓言、笑话中，凡是愚蠢的人，他的国籍往往是宋国。如大家熟悉的“守株待兔”的故事，主角即为“宋人耕者”（《韩非子·五蠹》）；“拔苗助长”的也是宋人（《孟子·公孙丑》）；《战国策·魏策》有宋人出外学习三年后回家直呼母名的笑话；《晏子春秋》有“宋人沽酒”的寓言。这一切，都代表了人民对宋人的鄙夷态度。因此，宋襄公要想做霸主，得到诸侯及人民的拥护，真是难上加难。任何人要想干成一件大事前，最好先认真地认识一下自己。

〔思考〕

战争和礼让看起来是天生的一对矛盾，但军礼却是古代五礼之一，在人类各个时期的成熟军事活动中也不乏近似于“礼”的规范和理念，那么，宋襄公究竟是错在“讲礼”还是缺乏基本的军事素养？